

达尔富尔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 及对中国外交的启示

姜恒昆 罗建波

内容提要 达尔富尔问题的实质是苏丹内部的治理危机和发展危机,其根源为当地游牧民与定居农民之间的资源冲突,以及解决这一冲突的传统协调机制的崩溃。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对达尔富尔冲突的性质与内容的理解存在夸张或曲解。中国与苏丹关系的发展,特别是达尔富尔问题的政治和解对中国外交具有特别的意义,它关系到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与维护、政治和外交原则的坚持、国家形象的塑造与提升及中国对国际事务的深度参与等重大问题。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所受到的外来疑惧、批评乃至诋毁,折射出日益发展的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艰难;而中国在此问题上的外交选择及政策调适,反映出成就负责任大国所应有的外交谋划和政策把握。未来中国对非洲政策应更具积极性、进取性和包容性。

关键词 中国 达尔富尔危机 政治解决 国家形象

作者简介 姜恒昆,世界史博士、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金华 321004);罗建波,法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91)。

苏丹达尔富尔危机及其解决进程是当前国际政治与安全领域的重大热点问题,而中国与苏丹互利合作关系的不断加强,以及中国在达尔富尔危机和解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07年7月,两个关于达尔富尔问题的重大成果进一步体现了中国在达尔富尔政治和解进程中的影响力:一是7月15~16日在利比亚召开的达尔富尔国际会议,确立了重新启动达尔富尔和平谈判和政治进程的时间表;二是7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部署联合国与非盟混合维和行动的第1769号决议。中国积极参与解决危机,并发挥重要作用,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在解决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研究达尔富尔危机的起源、性质、政治解决进程及中国担当的角色与面临的挑战,对于完善中国对非洲政策,以及更广和更深层意义上的中国外交与国家形象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达尔富尔问题的政治解决框架

达尔富尔问题是苏丹内部的治理危机和发展危机,其根源为当地游牧民与定居农民之间的资源冲突,以及解决这一冲突的传统协调机制的崩溃。^①然而,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却多用意识形态的眼光理解和关注苏丹问题,将达尔富尔冲突的性质与内容作了某种夸张或曲解。美国政府于2004年4月

^① 详见姜恒昆、刘鸿武:《种族认同还是资源争夺: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冲突原因探析》,载《西亚非洲》,2005年第5期,第9~13页。

强势介入达尔富尔问题，美国国会又于同年 7 月将达尔富尔地区冲突界定为“种族大屠杀”，而这一界定在同年 9 月得到美国调查团的正式认定。^①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对达尔富尔危机给予了密切关注，从 2004 年 6 月到 2007 年 7 月，仅安理会就通过了多达 21 项与苏丹问题和达尔富尔危机有关的决议，各种声明和报告更是为数众多。^② 正是在美国的“卖力”推动和一些国际组织的格外“关照”下，这一原属非洲国家内部的冲突被迅速国际化。

美国的介入迅速推动了达尔富尔危机的国际化，但其全面制裁苏丹的政策和举措并未得到联合国的认可，也为苏丹政府和非盟、阿盟所反对，即使美国的传统盟友欧盟国家也并未步美国后尘。从达尔富尔问题产生的根源和矛盾的症结看，制裁和孤立苏丹现政权不仅无益于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目前，以政治手段为主导、和平解决危机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一）三方协调下的维和行动和人道救济是当务之急

由于达尔富尔危机已造成较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动用区域和国际多边机制以遏止危机升级、保护难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就成为消除危机的先决条件。非盟于 2004 年开始在达尔富尔地区实施维和使命，此后不断加大对冲突的干预力度，维和人数逐步增至 7 000 多人，成为非盟对单一成员国内部冲突实施的最大规模的干预。^③ 鉴于非盟特派团受人员、装备、后勤及财力等因素的制约，2006 年 11 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提出了三阶段的维和方案：第一阶段为轻度支持阶段，由联合国向非盟部队提供 2 100 万美元的财政、技术和后勤支持；第二阶段为重度支持阶段，联合国支援非盟部队的人员和装备达到一定规模；第三阶段即混合维和行动，在达尔富尔地区部署“联合国—非盟混合维和行动”。在苏丹政府原则接受该方案的前提下，联合国安理会于 2007 年 7 月 31 日一致通过第 1769 号决议，决定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约 2.6 万人的联合国与非盟混合维和部队。安南方案的逐步实施及“混合维和部队”决议的通过是联合国、非盟和苏丹政府三方对话机制成功运作的结果，因此，今后的维和行动仍应重视和发挥这一机制的积极作用。

（二）平衡推动政治进程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维和固然重要，但是政治和解才是维和的最终目的。非盟和阿盟从地区安全及独立自主的角度明确拒绝个别西方国家对苏丹的武力威胁，强调以整体力量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积极寻求非盟框架内能被各方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此立场得到中国、俄罗斯等国的理解和支持。2006 年 5 月 5 日，在非盟等国际组织及一些国家的积极斡旋下，苏丹政府代表团与“苏丹解放运动”主要派别米纳维派经过 7 轮谈判，最终签署了《达尔富尔和平协议》，为结束达尔富尔的流血冲突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在各方的努力下，达尔富尔问题国际会议于 2007 年 7 月 15~16 日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举行，会议的重要成果是制订了重启达尔富尔和平谈判和政治进程的时间表，确立非盟、联合国和周边国家为政治解决危机的主渠道，宣布相关“路线图”进入谈判准备阶段。当前，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双轨”战略，即平衡推进维和行动和政治进程：一方面要尽早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混合维和部队，另一方面要积极推进达尔富尔地区的政治和解进程。当下，国际社会的任务主要是敦促未签署《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的派别尽早签署该协议。^④ 苏丹政府欢迎政治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先后颁布涉及财富和权力分配等内容的 200 余项总统令，以恢复当地的行政和法律秩序。一些地方开始重建民间管理委员会，逐

① 在美国调查团得出达尔富尔冲突是种族大屠杀的结论后，联合国就此问题专门派出“达尔富尔问题国际调查委员会”前往当地调查，该委员会于 2005 年 1 月提交的报告认为，苏丹政府并未在达尔富尔推行种族屠杀政策。See UN,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on Darfur to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 General”, January 25, 2005.

② 参见联合国中文网站“苏丹达尔富尔专区”，<http://www.un.org/chinese/peace/peacekeeping/sudan/scres.htm>.

③ See ICG, “The AU’s Mission in Darfur: Bridging the Gap”, Africa Briefing, No. 28 Nairobi/Brussels, July 6, 2005; “Getting the UN into Darfur”, Africa Briefing, No. 43, Nairobi/Brussels, October 12, 2006.

④ 达尔富尔反叛组织中仅“苏丹解放军”米纳维派在和平协定上签了字，“苏丹解放军”努尔派、“正义与平等运动”及“苏丹联邦民主同盟”（达尔富尔地区的一个反政府政治组织）均拒绝签署和平协定。一个月后，拒绝签字的这 3 个组织（派别）的领导人在阿斯马拉发表宣言，正式结成了名为“国家拯救阵线”（National Redemption Front）的联盟组织。

步恢复各族体间的传统矛盾和冲突的调解机制。

（三）发展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达尔富尔问题的根源是贫困和落后，只有通过经济发展和种族融合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如果不承认其资源短缺并合理分享这一生态脆弱地区的自然资源、不能恢复和重建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任何和平努力都将归于无效。因此，国际社会除应继续向达尔富尔地区提供人道援助外，还需提供资金、技术等发展援助，使经济复兴和政治和解平衡推进。在经济复兴的基础上实现各族间的真正宽容和共处，才是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根本出路，这也是那些忙于“灭火”的国际组织、西方大国，以及苏丹政府真正应该考虑与解决的问题。一味孤立和制裁苏丹政府，不仅难以迫使其屈服于外界压力，反而会进一步加剧达尔富尔地区的经济困难，恶化苏丹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使危机变得更加棘手。

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立场与作用

近年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及其发展走向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自从中国与苏丹建立起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特别是中国在苏丹石油开发中扮演重要角色之后，部分国际舆论将达尔富尔冲突与中国外交联系起来。除正常的中苏经贸合作被“政治化”外，一些西方媒体和国际组织还对中国不支持安理会就达尔富尔问题制裁苏丹横加指责，称中国因与苏丹政府有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而不愿向其施压。^① 近期，少数西方政客和非政府组织，竟以抵制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为由要挟中国向苏丹政府施压。由于西方国家主导国际舆论的话语权，上述言论的国际传播给中国国家形象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国际社会对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某些负面评价，主要来自少数西方人士对中国外交所做的刻意贬损。部分国家从自身外交利益出发，不仅不希望中非关系得到持续深化，也不乐于看到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持续增强。它们不仅担心自己丧失对非洲能源和市场的绝对控制，而且害怕西方国家的“民主”与“人权”观念受到挑战。一方面，非洲是西方国家的传统势力范围，“中国力量”和“中国因素”在非洲的快速增长无疑会刺激西方国家的敏感神经；在苏丹建立亲西方政权，将其纳入西方国家的战略轨道，也无疑是西方国家重要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及力量投向势必会引起国际社会的正常关切，而达尔富尔问题又加剧了它们对中国的疑惧和担忧。因此，及时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的外交政策和举措，坦陈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立场、态度和所作出的努力，无论对于回击“中国威胁论”，还是回应国际社会的善意关切，都显得尤为迫切。

（一）中国处理达尔富尔危机的主张与联合国、非盟的原则基本一致

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是联合国与非盟等国际组织处理达尔富尔问题的基本原则。在联合国安理会第 1590 号决议中，明确“重申对苏丹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承诺，并回顾睦邻、互不干涉和区域合作原则的重要性”^②。中国一贯坚持在尊重苏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通过对话与协商来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反对动用经济制裁和武装干预的手段，并主张任何形式的国际维和行动都应得到苏丹政府的同意。在落实安南方案和安理会第 1769 号决议的过程中，中国一方面鼓励和推动苏丹政府保持与国际社会的对话与合作，坚持方案和决议的大方向，通过灵活方式来落实自身关切；另一方面，中国呼吁并敦促有关各方把苏丹视为解决问题的当事方，与其进行平等对话与合作。通过政治谈判早日实现达尔富尔的和平、稳定与经济重建，是中国政府处理达尔富尔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① See Denis M. Tull, "China's Engagement in Africa: Scope, Significance and Consequences",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September 2006, pp. 459 - 479; Joshua Eisenman & Joshua Kurlantzick, "China's Africa Strategy", *Current History*, May 2006, pp. 219 - 224; Michael Klare & Daniel Volman, "America, China & the scramble for Africa's Oil",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No. 108, 2006, pp. 297 - 309; Ali Askouri, China's investment in Sudan, Displacing Villages and Destroying Communities, in Firoze Manji & Stephen Marks (eds.),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hina in Africa*, Cape Town, Fahamu - Networks for Social Justice, 2007, <http://www.fahamu.org/pzbook.php>.

^② 联合国安理会网站, <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prinorgs/sc/sres/05/s1590.htm>.

（二）中国劝和促谈的外交努力取得了初步成效

自达尔富尔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一直扮演着劝和促谈的角色，并通过元首互访、派遣特使、通电话、互致信函及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进行协调等多种途径与各方沟通，力争缩小各方分歧，推动平等对话。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还曾专门致信巴希尔总统，呼吁苏丹采取切实措施以缓解危机。2006 年 11 月，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中、苏两国元首就安南方案进行了沟通。2007 年 2 月 2 日，胡锦涛主席在峰会后的首次非洲之行中访问了苏丹，提出处理达尔富尔问题应遵循的四项原则：（1）尊重苏丹主权和领土完整；（2）坚持对话和平等协商；（3）非盟、联合国等应该在达尔富尔维和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4）促进地区稳定。^① 中国政府先后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了 5 个了解实地情况的特使团，2007 年 5 月 10 日，首次任命了以达尔富尔问题为近期工作重点的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应该说，苏丹政府能够有保留地接受安南方案及安理会第 1769 号决议，同中国的斡旋与协调有重要关系。

（三）中国积极支持和参加联合国与非盟在达尔富尔的维和行动

自非盟于 2004 年开始在达尔富尔地区派驻特派团以来，中国一直积极支持非盟在解决达尔富尔危机中的主导作用，先后向非盟维和行动捐款 180 万美元。中国政府还积极敦促苏丹政府接受安南方案。在苏丹政府原则接受该方案的前提下，中国继而推动联合国安理会于 2007 年 7 月 31 日一致通过了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联合国与非盟混合维和部队的第 1769 号决议，并率先于 2007 年 11 月向该地区派出兵分队，开始进行部署混合维和部队的准备工作，这是联合国成员国在此次混合维和行动中派出的第一支部队。参与和支持联合国、非盟在达尔富尔的维和行动，不仅可以维护苏丹的国内稳定，也有助于巩固与苏丹的友好合作关系，充分展示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决心和能力。

（四）中苏经贸领域的互利合作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达尔富尔问题

中国关注达尔富尔地区的人道主义和安全状况，已向苏丹政府提供总额为 8 000 万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物资援助。^② 由于认识到达尔富尔问题的实质是发展问题，中国还把苏丹经济发展和达尔富尔地区的经济重建视为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关键。中苏经贸合作涉及投资、贸易和劳务合作等多个领域，其中最重要，也是最为国际社会所关注的，当属中苏能源合作。自 1995 年进入苏丹以来，中国石油企业使苏丹由一个石油净进口国成为石油出口国，并建立了上下游一体化、技术先进、规模配套的石油工业体系。石油项目全部投产后，苏丹每年可增加国内生产总值约 17 亿美元。^③ 不仅如此，中国石油企业还积极关注当地民生，为当地援建医院，修建桥梁、机场，以及道路等基础设施，改善当地群众的生活条件。截至 2006 年底，中国石油集团累计投资苏丹公益事业 3 228 万美元，受益人数超过 150 万人。^④ 通过经贸合作和发展援助推动彻底解决达尔富尔问题，是当前中国外交的特色和亮点之一。

达尔富尔问题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启示

中国与苏丹关系的发展，特别是达尔富尔问题的政治和解对中国外交有特殊意义，它关系到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与维护、政治和外交原则的坚持、国家形象的塑造与提升，以及对国际事务的深度参与。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所受到的外来疑惧、批评乃至诋毁，反映出和平发展的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艰难；而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所做的外交选择及政策调适，反映出成就负责任大国所应有的外交谋

① 参见《人民日报》，2007 年 2 月 3 日。

② 参见翟隽：《中国积极推动解决达尔富尔问题》，载《求是》，2007 年第 11 期，第 61～63 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丹大使馆经商处：《中国在苏丹的石油项目》，<http://www.krcsd.com/sudan/news/5.htm>。

④ 薄熙来：《中国石油在非洲石油投资上所作贡献有目共睹》，<http://news.oilnews.com.cn/system/2006/11/06/001025164.shtml>。

划和政策把握。作为一个综合国力仍然有限但已认识到自身海外利益和国际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在危机时刻和危机地区应该如何权衡与取舍自身的各种利益,在与相关国家交往时应该如何确定自己的角色内容,在不断变化的国际舞台上应该如何进行外交工具的选择和“软实力”的建构等,都是中国当前和未来外交工作必须正视并解决的迫切问题。事实证明,中国围绕达尔富尔问题所作的努力,不仅体现了中国所秉持的外交基本原则的强大生命力,也反映出中国外交与时俱进的鲜明特色。

(一) 维护海外经济利益已成为中国外交的重大课题

目前,苏丹的能源投资是中国在海外最大、最完整的石油投资,覆盖勘探、采油、输油管、炼油厂和港口等诸多领域。中国石油企业成为苏丹境内最大的外国投资商,在苏丹的国际石油财团中拥有最大的股份。中国从苏丹进口原油也从1997年的27万桶增至2006年的485万桶,已占中国海外进口石油总额的3.3%。^①中苏能源合作的意义不仅在于对苏丹石油的长远开发,更在于它是中国在整个非洲石油开发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关系到中国与非洲的长远能源合作。以苏丹为起点,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开发已遍及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尼日利亚、突尼斯、利比亚、肯尼亚、尼日尔、乍得等国。为有效维护自身在苏丹的合法经济权益,一方面,中国政府明确反对部分西方国家试图全面制裁苏丹,甚至直接实施军事干预的企图,维护苏丹的主权独立及国内稳定和统一;另一方面,中国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达尔富尔危机的道义关切,建设性地推动和参与国际多边维和行动和人道救济,并在双边关系中督促苏丹政府采取更为灵活的态度与国际社会进行合作。中国的立场和努力,既在最大程度上维护和巩固了自身海外权益,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达尔富尔和平进程的良性发展。但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在苏丹问题上的“关注”给中国外交带来了不少压力:一是不少西方人士和媒体指责中国在苏丹的投资忽视民主和人权状况,严重损害了中国在非洲的外交形象,使中国被迫进行大量的反驳、解释和回应,极大地增加了中国外交的成本和难度;二是达尔富尔危机的国际化给中国在该地区多年苦心经营的海外石油利益投下了潜在阴影。这不是中国企业在海外拓展时遭遇难题的特例,而是中国在拓展海外经济活动空间时遇到的众多挑战中的一个缩影。这是中国外交需要特别予以关注的议题。所以,在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进程中,中国企业不仅需要考量成本收益比较和双边政治关系,还需要综合权衡潜在的投资风险和企业形象,更深层次地了解 and 领会海外经营技巧及利益拓展所需要的国际制度环境。

(二) 不干涉内政仍是中国外交政策应秉持的基本原则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中之一就是不干涉别国内政。这一原则有效地维护了中非友好关系的巩固和发展,成为中国对非洲外交与西方国家对非洲政策的最显著区别之一。中国反对西方国家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对苏丹采取单方面的军事和经济制裁,主张以政治和解为主、并充分尊重和考虑苏丹政府的关切,就是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坚持。在达尔富尔危机的解决进程中,中国固然需要坚持原则以维护自身一贯的外交立场,同时也需灵活运用外交手段以应对形势发展的需要,同时兼顾中国海外利益、中国同苏丹关系、中国同国际社会的良性互动等多层面的复杂关系。中国通过多种途径劝和促谈,以弃权票的方式表达了自身对联合国第1556号、1564号决议的立场,就是综合平衡各方权益后所做出的外交选择。“弃权”并不必然不利于中国的大国形象塑造,它表明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既坚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和原则性,又避免了与世界主要大国的直接冲突。不仅如此,中国还积极参与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在苏丹的维和使命,表明中国对合法集体干预的接受与认同,并愿意在国际多边行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 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优化已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

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优化,并不仅仅在于取信于周边国家和西方大国,非洲国家作为中国传统的战略盟友和重要性日益上升的经贸伙伴,它们对中国发展的认同、接受,乃至主动效仿,也必然会

^① 田春荣:《2006年中国石油进出口状况分析》,载《国际石油经济》,2007年第3期,第16~18页。

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中国当前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和舆论环境，拓展中国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国际空间。同时，中国在非洲树立良好形象还能够使中国更为稳定和安全地获得经济发展所需的原材料与商品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此外，在非洲树立良好形象及中非关系的持续发展也能有效回应部分西方人士对中国发展的种种担忧和诋毁，有效展示中国诉诸于和平发展的战略意图。更为关键的是，非洲是中国拓展国际影响力、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舞台。达尔富尔危机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提出了严峻挑战，因为中国既要尊重苏丹政府的权益和主张，又要避免同以“民主”和“人权”为口号的西方大国发生正面冲突。为解决这一矛盾，中国需要制定和执行立场鲜明的外交政策，同时也需要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展示自己在危机处理中的外交努力和责任担当。完善和优化国家形象，离不开适时的形象战略和精致的国际宣传策略，中国必须重视在技术层面宣传自己的外交思想和政策。

（四）承担更多的“全球责任”是中国外交的新使命

长期以来，中国一贯强调“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即外交为国内建设服务。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向前推进，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促使中国在关注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更加关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并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秩序的建构和承担更多的全球责任，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非洲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地区，但非洲国家正在努力寻求和平与发展，在此重要阶段，中国应在自身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非洲国家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做到“量力而行”和“尽力而为”的有效统一。事实上，通过与非洲国家的合作，带动中非双方的互利发展与共同繁荣，已成为中国彰显自身发展于世界是机会而决非威胁的生动例证。具体到苏丹，中国政府应更多地鼓励中方投资企业更多地支持苏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增加对达尔富尔危地区的人道援助及对联合国与非盟在苏丹维和行动的人员和财政支持，这些都能体现出中国的真正大国责任。未来的中国外交应更具进取性、开放性和包容性，在合理保护自身日益扩大的海外利益的同时，更多地承担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责任。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邢永平）

· 资料库 ·

毛里求斯排名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良政表现首位

据加纳《每日写真报》报道，根据关于非洲国家管理的易卜拉欣指数，加纳已进入 2007 年非洲国家良政表现排名前十位。在其中，毛里求斯排在首位，其次是塞舌尔、博茨瓦纳、佛得角、南非、加蓬和纳米比亚。表现最差的国家是索马里、刚果（金）、乍得、苏丹、几内亚比绍及中非共和国。

易卜拉欣指数是对撒哈拉以南非洲 48 个国家政府管理能力进行综合评价的工具。它主要通过对照

全、法制、人权、透明度和腐败、可持续经济和人力发展机会等 5 个方面的表现进行衡量。2007 年该指数显示，加纳在上述五方面得分分别是 85.9、70.1、67.7、46.5 和 63.8。

（资料来源：中国驻加纳大使馆经商处，2007 年 12 月 7 日）

（詹世明 摘编）

Course of the Political Solution to the Darfur Issue and Its Inspiration for China's Diplomacy

Jiang Hengkun & Luo Jianbo

pp. 5 – 10

The essential of the Darfur Issue is the internal crises of Sudanese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which rooted from the clashes for resources between the local nomads and agricultural residents and from the breakdown of the tradition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of solving the conflicts. The U. S. and some west states have exaggerated and distorted the nature and content of the conflicts in Darfur. It is significant for Chinese diplomacy to develop China – Sudan relationship and obtain peaceful political solution to the Darfur Issue, which is linked with many major areas of China's interest as in the extens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oversea interest, the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principles, the national image and China's in – depth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external misgivings, criticisms and even imputations that confront China reflect the hardness in China's general engage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owever, the diplomatic alternation and policy adjustment that China has made on the Darfur Issue indicate the appropriate diplomatic design of a responsible power. The vision of China's African policy should be more active, enterprising and comprehensive.

Issues of North African Migration to Europe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ir Impacts

Liu Xiaoping & Liu Hongwu

pp. 11 – 16

The tide of migration to Europe appeared in five North African countrie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cause of which can be various, with the dynamics not only of economy, politics and social culture, but also of history, geography and living environmental factors. Tremendous migration tide caused complicated social issues both in North African and European

countries, and imposed impacts in many respect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ountries of North Africa, Europe and Sub – Sahara Africa. The North African and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been taking measures to solve the social issues caused by migration for a long time, but are still encountering challenges though having made some achievements.

UK – Libya Relation: Dramatic Changes

Gao Jinyuan

pp. 17 – 22

For over half a century since Libia's independence, four dramatic changes by phases have taken place in UK – Libya relations: from the close friendliness in Idris monarchy to the cold hostility in Kadhafi regime, with the latter related to the policies of Kadhafi. After 1998, thanks to the policy changes of both the countries,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thawed

out rapidly and approached to an all – around cooperation. It seems that it is Libya that has first made the concession under the external pressure, with the internal economic factors as well, but actually UK, considering its economic and strategic interest, has expected this change more than Libya.